

# 耶鲁学派成因初探

罗杰鹦，骏远

(浙江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本文考察了耶鲁学派跟新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之爭的关系,探讨了耶鲁学派文学批评理论的由来,并指出了耶鲁学派各成员之间的异同之处。

**【关键词】**社会历史批评 新批评 解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0)02-0153-03

## A Brief Examina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Yale School

LUO Jie-ying, JUN Y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is essay briefl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Yale School and New Criticism as well as social historicism. It tries to seek the origin of the Yale School's literary critical theory, attempting to point 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screpancies among the Yale colleagues.

**Key words:** social historicism; new criticism; deconstruction

20世纪70年代，“耶鲁学派”(The Yale School)异军突起。他们通过文本的解读来证实自己的学说。他们认为，应该对文本放任自流，予以充分的符号自主权，文本不 应该被置入任何等级制度中，尤其是长期以来我们所惯有的能指/所指等级制度，文本并非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能够敞开一个世界——它根本就没有敞开过，而只是在内部通过符号的相互追逐嬉而自行其乐。意义被耶鲁学派从文本那里驱赶走了。神、理念、逻格斯(logos)和本质也被从哲学中驱赶走了。<sup>[1]</sup>

耶鲁学派为何提出上述论点？要了解耶鲁学派的后结构主义成因，就必须考察它跟新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之爭的关系。

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南方新批评干将C·布鲁克斯和R·P·沃伦入主耶鲁大学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系，努力发掘形式主义文化优势，决心同社会历史批评较量一番。所谓“新批评”原指以J·C·兰色姆和A·泰特为首的一群南方文论家。兰色姆和泰特分别创刊《肯庸评论》和《西瓦尼评论》，发展了T·S·艾略特与I·A·端恰慈所开创的文学“本体论”(Ontology)。从其对文本批评的角度看，新批评过于保守，不合时宜。然而，这些新批评家从内部开拓文学荒地，揭示了社会历史批评的局限性。社会历史批评过分强调文学的社会功利和人为价值判断，视作品为现实的直接摹仿或简单反映。它常常忽略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内在逻辑和语言技巧。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左翼活动退缩，社会历史批评失去了政治运动的后盾，使新批评昂首挺胸一举北进，占领了学术重镇耶鲁。50年代，新批评家们继承了S·马拉美所谓“诗不是用思想而是用语言塑成”的观点，陷入了对文本的盲目崇拜。正因为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走向了极端，与其对抗的新理论也就应运而生。

继新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之后的美国文论发展恰似一场循环马拉松赛，形成了一个“主流更

[收稿日期] 1999-09-07

[作者简介] 罗杰鹦(1965-)，女，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骏远(1955-)，男，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及小说理论研究。

迭'的文论时代。‘是历史还是文学’的问题成了文坛的中心和历史性焦点。以耶鲁大学教授布鲁姆、哈特曼、德曼和米勒为核心的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批评家们也积极投身于这场争论。他们提出割裂历史与文学去追溯文学进步是不可能的 文学是历史的一部分。

耶鲁学派的形成,主要得益于法国后结构主义。1970年,法国后结构主义先驱罗兰·巴特著名的《S/Z》首先向结构主义文论挑战,耻笑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见解,强调文学互文性和符号流动特征,从而否定作品只有一个恒定结构及终极意义,并为此提供批评工具。巴特早在《风格与其意象》一文中扬言,文学作品(或任何写作)就像洋葱头,一层层剥去“无数的包皮”之后,并无内蕴核心可得。同时,德曼促成了德里达对耶鲁大学一年一度的访问与讲学。德里达打开了逻格斯中心之锁——解构一个对立命题,乃是取消对立,转移它的位置,置之于不同环境背景之中。

由于米勒和德曼等人在比较文学方面的特长,又加之四位教授对形式结构的共同反感,耶鲁批评家们在70年代决意以一个学术团体的名义,掀起美国文论的大论战。他们的合作造就了解构主义的声势和力量,吸引了大批学术摹仿者,尤其是女权批评家、心理分析学家、建筑学家、同性恋批评家和性批评家,以活跃学术气氛。米勒曾经炫耀:一旦掌握解构文学,即能有效地“破坏西方行而上学机制”——后来这成了解构主义者们的中心任务<sup>[2]</sup>。德曼申斥新批评寻求诗的有机形式的幻想(《美国新批评的形式与意图》)。布鲁姆则声称莎士比亚以来的整个文学史是“一幅误读图(《影响的焦虑》)。耶鲁同仁们的文学批评在美国70年代文坛上可谓独树一帜。

我们发现,耶鲁学派批评的重中之重在于它空前突出地体现了当代文论的神圣性和神秘性,以及伟大批评家驱赶或呼唤伟大诗人的权力意志。耶鲁学派对文本虚无之后的价值追求本身已超越了形式主义,进入高度发达的语言哲学和论证阶段。虽然,耶鲁批评家至今仍然未能把自然科学融于当代文论,但是他们加深了人们对文学研究的必要性的认识。他们拒绝听任文学故步自封,拒绝放弃使文学超越意识形态的主张。有些社会历史批评家们也不得不承认,没有解构主义,就没有现代社会的进步。事实上,自从80年代以来出现的文化批评是解构主义的延续。<sup>[3]</sup>

笔者认为,德曼等四位教授开始实践文学批评活动时,并没有意识到所谓的解构主义运动。直至70年代,他们也只是对他们周围的学术氛围作出本能的反映。1965年春天的耶鲁文学批评学术会议使雅克·德里达和拉康首次踏入了美国文坛。产生于耶鲁学术会议以及1966年召开的霍普金斯大学学术会上的论文便成了标志欧洲大陆批评代替美国本土新批评的一个决定性社会事件。耶鲁批评的实践源出于美国新批评。耶鲁学派理论只注重延展“终结性”的解释,而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试图把歧义极端化。美国解构主义的主要切入点在于提供一个更为辩证的观点来证明文本的开放性。哈特曼认为耶鲁批评家发动了一场文学运动,此运动早在德里达理论登场前已开始。<sup>[4]</sup>相反,E·兰特里夏却把耶鲁学派描述为“改变哲学时尚的校园之花”。<sup>[5]</sup>然而,我们应承认耶鲁学派的实践奠定了解构主义的“前期”活动。解构主义于50年代中期就在美国有了雏形。哈特曼1954年著的《未经调节的视象》(The Unmediated Vision),在D·阿金斯看来就是解构主义的原型。

耶鲁学派是活跃在当代文坛上的批评家,至今在国内外仍有相当大的影响。保罗·德曼虽然已于1983年逝世,但其影响仍在,而且其后由他的夫人编集出版了《美学意识》(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尽管如此,“耶鲁学派”这一名称本身却有可商榷之处。除了哈特曼、布鲁姆、米勒和德曼这四人同在一个校园之外,他们被相提并论还可能跟著名批评家F·诺里斯把他们统称为“校园之花”有关<sup>[6]</sup>。然而,这种归类容易使读者误以为这四位耶鲁学者完全一致地倡导同一文学批评主张。其实不然,这些批评理论家分别代表了当代理论界的主要思想。德曼代表修辞批评,米勒代表美国解构主义,布鲁姆代表美国成文性对照批评理论,哈特曼代表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理论。笔者认为,杰弗里·哈特曼和哈里德·布鲁姆应被冠以温和解构批评家的称号。就在那部被认为是耶鲁批评家宣言的《解构与批评》(Deconstruction & Criticism)的前言中,哈特曼就实事求是

是地说过，德曼和米勒是解构主义的魁首(boa-orproto deconstruction)，而他本人和布鲁姆则只能勉强称得上解构主义者。后面这两位在某些场合甚至还撰写反对解构主义的文章。<sup>[7]</sup>当然，这四位学者还有不少共同之处。例如，他们对文学批评的重要性有着共同的认识，即除了学术和教学的功能以及阐释文学文本的服务功能之外，文学批评还有使哲学和文学相结合、使反思和修辞相结合的力量。米勒和哈特曼都曾经指出，文学批评理论具有社会功能，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具有同等地位，而不是传统认识中的隶属关系（《理论的现在和过去》，米勒《荒野中的批评》，哈特曼）。

还须一提的是，四位学者在早年批评活动中共享历代文学大家的文本，如弥尔顿、威廉华滋沃斯、斯蒂芬、雪莱和布莱克等人的文本。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法国理论家的影响，如德里达、克里斯蒂瓦、拉康、福柯和巴特的影响。他们还共同享有一些文学批评原则，如“互文性”“不确定性”和“误读性”，从而使自己与法国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或美国新批评迥然有异。后者把文本当作客观模式，把批评看作人文科学，而耶鲁学派则认为文学批评本身是一种文学形式。他们还撰文互相批评或辩护。例如，德曼以《盲视与洞视》评论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而布鲁姆则以其《历时性修辞》一文阐述了他本人与德曼和哈特曼之间的异同；布鲁姆的《误读论》为德曼而著，哈特曼在《荒野中的批评》中有一节评述布鲁姆，称之为《神圣丛林》，米勒撰写《理论的现在与过去》捍卫德曼，反驳了一些批评家对其战时作品所作的攻击与指责。

四位耶鲁学者被划入同一学派也是一种巧合。众所周知，他们在同一年（1975年）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同一主题的论文。例如，德曼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一篇论及尼采，刊登在《耶鲁研究》杂志上，另一篇论及卢梭，刊登在《佐治亚评论》上；哈特曼撰写了《阅读的命运》，其中的许多篇幅被用来评论德曼的《丧钟》；布鲁姆同年产出两本著作，即《误读论》和《卡布拉和批评》，表明了他是所谓‘解构学派’的影子，并显示了他在当代用英文写作的理论批评家中所具有的创造力和召唤力；米勒则发表了重要评论，如《论W·史蒂文斯》，提出“解构主义”是“一种基本的阅读行为”，还断言文本自行其事，独立自主，文本总表达出自己的“不可解结（aporia），等等。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耶鲁学派提出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方法并不像有些批评家认为的那样提倡虚无主义。恰恰相反，解构主义是对纵横交错的语言、意义经纬织成的历史文化潜意识网络的清醒认识。而且，他们的理论在不断的发展并完善。其中布鲁姆提出阅读行为中人文主义的一面即为例证。不过，我们必须承认耶鲁学派的著作非常艰涩。由于他们刻意追求复杂的“理论节奏感”，过分追求德国式的逻辑严密性，他们的学说反而不够系统化，前后缺乏连贯性。因此，耶理学派并没有被奉为系统理论家。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理论是从对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理论的挑战发展而来的。因此，只有将耶鲁学派放入整个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去认识分析，才能对它有一个客观、辩证的理解。

## 【参考文献】

- [1] Paul de Man,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reprinted in Yale French Studies, 1986, p. 121.
- [2] Ross Murfin, *The Bedford Glossary of Criticism & Literature Terms*, Boston & New York, Bedford Books, 1997, p. 22.
- [3] J. H. Miller, *Theory Now & Then* (Preface), first published in 1991 by Harvest Wheatsheaf, p. 4.
- [4] G. D. Atkins, *Criticism as Answerable Style*, London, Methuen, 1985, p. 124.
- [5] G. D. Atkins, *Criticism as answerable Style*, 1985, p. 127.
- [6] C. Norris, *The American Connection*, revised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1991 by Rouledge, p. 96.
- [7] Imre Aslusinsky, *Criticism in Society*, New York & London, Methuen, 1987 p. 81.